



逃犯条例 深度

专访周永康：这场运动激活了香港，在痛苦中打开未来

2014年之后，好像有种感觉是，香港未来已经被关掉了、就这样了、没有希望了。但在2019年，抗争者又慢慢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个运动激活了香港。这个运动不断地在挑战中国的政治宣传、重新说香港的故事。香港故事可以不从回归讲起，可以不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讲起，是可以重新去打开这个辩论，去讨论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威力无穷的。

端传媒记者 何欣洁 发自台北 | 2019-09-28



周永康，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担任学联秘书长，于2016年因参与重夺“公民广场”行动，被判非法集会罪成立。
摄：林振东/端传媒

五年前的9月26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秘书长周永康与其他学生发起秘密行动，重夺被政府封锁的“公民广场”（政府总部东翼广场），行动随即遭警方清场、数十名学生遭逮捕，引燃群众前来声援。9月28日，后被称为“占中三子”的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宣布，酝酿多时的“占领中环”行动正式启动，揭开了雨伞运动的序幕。

在运动中，周永康因常上大台主持，与学联常委罗冠聪、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被并称为“双学三子”，周永康、罗冠聪并于10月21日偕学联副秘书长岑敖晖、常委梁丽帼、常务秘书钟耀华与政府对话，其中一名政府对话代表，即为今日特首、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林郑月娥。

雨伞运动为期79日，并未达成当初所设定的“争取真普选”目标，群众对大台上的学联、学民思潮干部多有不满，一连串事件相互引爆下，大学学界发起“退联”（退出学联）潮。2016年，周永康因重夺公民广场行动，被裁定“煽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罪名成立，其后入监服刑。

出狱后，周永康依原本规划，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地理学博士课程。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群众共识之一即运动“无大台”，言明记取雨伞运动经验，不再认运动有领导，人人皆可做大台。期间，周永康与黄之锋投书纽约时报，以〈香港人民不会被中共吓倒〉为题，持续在运动中发声。

五年后的今日，香港由“伞后”的低迷，重新踏上“反修例”新局。周永康如何回顾当年与林郑月娥的“对话”经验？如何看待一国两制？作为香港90后，他如何理解今日风起云涌的本土思潮？以下为《端传媒》与周永康的访问记录。

端传媒：当年雨伞运动，你曾经以学联秘书长的身分跟政府对话，当中的谈判代表之一，就是今天的特首林郑月娥。但到2019年这场运动，香港人多数已经不相信跟政府对话能获得什么成果，人们宁愿持续在街头上抗争。你现在怎么回头看五年前你们跟政府“对话”这件事？

周永康：当初运动过程每天都有扑天盖地的压力，都在身体跟精神的极限、在一个高张力的过程里面，（促成对话的过程）有很多人的介入、很多人对于“对话”的想像在里面，其实是一个很短、很仓促的决定。

这五年来，我们几个都没有机会很深入地再谈“当初为何会发生这个对话？对话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如何发展、后续发生什么影响？”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重新思

考这件事情。

当时要对话，最大的压力，就来自于防止血腥镇压，不可以让八九六四再重来。其实在928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可以对话了，同时，也知道林郑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结果是不会改变的，但928之后有很多风声说可能会镇压，很多人都吓坏了。

站在学联的角度，对话好像是一个不由自主的决定，但也可以说，这是八九六四的阴影在香港上空徘徊，这个阴影，让对话成为香港政治菁英很常见的一种妥协、或者说是反对派跟政府之间的一种作法。站在今天来看，所谓的谈判跟行动是不是对立的？其实也不一定。可能是对话时间点，是不是有足够的force逼对方上谈判桌，然后继续施压？学联在对话后，其实也是想要做这个方向，希望回到行动本位，只不过行动的方向、型态、时机都不同了。

雨伞时，最后大家认识到政府完全没有回旋的空间，人再多它也不会让、好好谈它也不会让，所以后面才会出现更radical的行动，浮现了更强的本土乃至独立思潮，然后2016年发生旺角事件，之后政府又DQ自决派议员，最后竟然还要推《逃犯条例》。一路让人们看到，香港政府就是一个扯线公仔、中共在背后言而无信，人民对他们没有信任，又有上次雨伞运动的经历，所以这次会更加确信，没有任何谈的空间，只能用force逼他退让。

所以，这次没有人要跟政府谈判了，某程度来说，也可说中共是自吃苦果。



2019年6月9日，民阵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民阵宣布有103万人参与。摄：林振东/端传媒

从对话到揽炒，是因为现在跟80年代很不一样。那时候香港菁英是谈判主体，他们去跟港英政府谈、去游说英国、去北京谈，民间一般人都没办法参与。当年没办法参与的普罗大众，今天站在最前线，意思就是说“我摆明不跟你玩这一套。”

端：你觉得香港人对于运动可以“对话”的状态，是怎么进展到今天的“揽炒”呢？那刚刚说的“六四阴影”消失了吗？怎么消失的？

周：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6年的旺角，让香港人重新去思考抗争者与警察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心理准备。这次从6月9号的百万人游行开始，有好几次小型、大型的冲突，节奏跟雨伞运动很不一样。雨伞运动一开始投下催泪弹，是近十年除了韩农WTO抗议之外不曾有过的事情，大家都很震惊，还没有心理准备。但经过雨伞运动、2016年的旺角事件关于“和理非”与“勇武”抗争，大家都亲身领略过两者的长短之处，有种被逼着不断学习的状态，逼着大家要不断地去武装、去练习勇武与和理非之间的灵活性。

到了雨伞运动后期，大约十月中后，“六四重演”的说法基本已经慢慢被打破，后来抗争者会透过警方暴力的程度去思考、判断是否会出兵，这次抗争者也会以“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来回应“出兵论”；还有一个（跟伞运）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民间社会对这场运动是有很高的支持度，这样的高支持度，让运动者可以有一个很强的支持力量，国际舆论上也是很一面倒地支持抗争，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八九六四的阴影，基本上已经慢慢淡去，大家对六四这个压力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大家直面恐惧与忧患带来的压力，应对恐惧、设想最坏的情境。我觉得蛮厉害的，这真的是一种进化。

14年的时候，很多人忧心运动演化成1989的路径，在这样的情绪下，大家已经没有空间去思考“政府是否在虚张声势？”但这次，虽然政府动作很多（威胁要以武力镇压抗争），但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人们明白中国对香港牵一发动全身，武力镇压的代价恐怕谁也承受不起。而且香港警察现在已经是半军装状态，某程度也用不着六四就可以镇压。另一方面，运动者对于警察使用子弹，也已经长出了应对的策略，甚至有人会说“如果解放军真的来，那就回家睡觉吧！”

从对话到揽炒，是因为现在跟80年代很不一样。那时候香港菁英是谈判主体，他们去跟港英政府谈、去游说英国、去北京谈，民间一般人都没办法参与。那时候政治气氛也很不一样，中共说要做改革开放，那香港也看看你改革要怎么走。今天很摆明就是大家不跟你玩这一套了。当年没办法参与的普罗大众，今天站在最前线，意思就是说“我摆明不跟你玩这一套。”所谓的揽炒，就是“如果你想吞了我，我就在喉咙里面把你噎死，不会让你好过。”这次不会有政治菁英来劝人说“不想流血就要谈”，事实上也没有哪个核心组织可以让你去劝。所以说“谈不谈”，14年跟19年的状况很不一样，但14年的经验，又影响了19年的判断，还会继续演变下去。

当年，香港人的命运是掺杂地缘政治因素的，是因为中国、英国、美国、台湾的交锋，才决定了香港要往这个方向走；但今天香港是不是可以反客为主，利用这个国际局势，反过来决定一国两制要往哪个方向走？

端：你现在怎么看一国两制？

周：中英谈判中香港没有角色，中英谈判的真实细节香港市民也所知不多。只有很少数的人，例如李柱铭，是当时的历史见证人。但雨伞运动之后，更多年轻人开始对一国两制去寻根究底、有更大的动力去理解香港在80年代发生什么事情，最明显的例子譬如“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年轻一代开始去回顾当年的谈判过程，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但在2014年8月31日之前，不管是泛民，或者学联、学生，论调都只希望中央“做到《基本法》的承诺、在17年你要进行改革”，根本还不会有人去溯源、去找回80年代那些辩论，重新去检视基本法立约、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的草签过证是否黑箱作业、过程为何、有否正当性。大家当时只是要政府“遵守诺言”，就好像赵紫阳在80年代回信给港大学生会，承诺说会“民主治港”，我们当年就是有一种拿那封信要求中央兑现承诺、实施普选的感觉。



2014年9月28日，防暴警察向金钟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摄：Xaume Olleros/AFP/Getty Images

一直到八三一大人决定、雨伞运动期间，发现对话之路已死、谈判没有用了，才开始去讨论这些想法到底对不对，才有人去找回80年代的辩论，发现当年甚至还讨论过“要不要回归？”这样很根本的问题。像是1990年8月出生，刚好是香港《基本法》正式颁布后4个月，我根本不会知道那是什么过程。现在回头去看才发现，哇，这什么鬼？

历史性地看来，一国两制是一个荒谬的、由一连串历史的巧合与悲剧形成的妥协结果。一国两制方案本来是要给台湾用的，但没有办法马上用在台湾，邓小平才会说“那先给香港吧！”其实当时香港人根本没有参与的空间，从来没有说过要一国两制，等同于被英国出卖、中国吞并，让97之后的人都活在一国两制里面，被中英决定了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香港人既然从未同意过一国两制，它的制度正当性本来就很脆弱，注定要产生很大的张力与冲突。今天这场运动，是重新去塑造一国两制，去看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当年，香港人的命运是掺杂地缘政治因素的，是因为中国、英国、美国、台湾的交锋，才决定了香港要往这个方向走；但今天香港是不是可以反客为主，利用这个国际局势，反过来决定一国两制要往哪个方向走？对香港人来说，你一定要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把真普选等本来的承诺还给我，否则越来越多人会去认同自决，甚至心往港独，也不奇怪。港独论述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它未必是排外、对立与民族主义的，虽然不能否认这些面向的存在与作用，但也有更多面向是在反击专制制度，例如会去质问“中共凭什么说你是中国？为什么香港一定是你的？什么是中国？是中共操作下的中国？情感上的中国？还是中华民国？”运动会开启这些讨论，这些讨论的过程，也会反过来影响这场运动。

在运动中，个体生命并不是完全透过个体思考形成的结果，它是群体构成的一部分，而群体也在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这当中有很多拉力、不同动力，通过互动来彼此形塑。运动提供了一个平台跟空间，去实践理想跟理念，也形塑一个群体。

端：雨伞运动里，开始慢慢出现“本土派”，“香港人”的身分认同感觉开始慢慢在成形，到了这次运动，香港的形象与精神面貌看来就清晰。你怎么看香港的本土思潮？

周：我自己觉得，香港本土思潮形成，有三个阶段。2010年开始，开放自由行、出现“单非”议题、新移民议题，中港张力去到一个高峰，开始有这个思潮。2014年是第二个阶段，梁振英去骂本土派“港独”，开始把身分政治拉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大家开始讨论自决与独立的不同？思考一国两制是什么？你是不是在香港出生？香港人如何定义？这都是慢慢讨论出来的。

到了2019年第三个阶段，香港人的认同其实已经相对确定。“香港精神”的意涵可能还在运动中慢慢发展，但在运动当中，参与者会慢慢去确立“这是香港人”。这些运动策略里，包括“不割席、不笃灰、齐上齐落”等口号，其实是有一些原则、有一些看法在其中，这些原则可以维持群体向心力、不能坠落，这会让香港精神的内涵更丰富，比起在雨伞的时候更确定、更强烈。

雨伞运动可能也有长出一些东西，例如“香港人不只是经济动物、也会参与政治”“香港人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而是可以为了他人而站出来、牺牲、承担责任”，这些东西到2019年已经越来越坚固，是透过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去创造一种社群的身分认同。换句话说，是运动拉开了一个平台跟空间，去实践这些理想跟理念。



2016年2月9日，旺角骚乱中的一名示威者手执砖块。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这会继续发展下去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应该要保持一种开放性，要思考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运动、怎么跟人家沟通、辩论、说服、转化。在运动进行当中，每天都会发生不同事情，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东西，不用急着去做总结。事实上运动就正在发展，没有人可以就运动去做总结。

身在运动中，你不太有时间回头看自己，当中的每一步决定都不是后设的，没有时间好好思考下一步怎么走才走出去的。这很玄，你会发现个体生命并不是完全透过个体思考形成的结果，它是群体构成的一部分，而群体也在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这当中有很多拉力、不同动力，通过互动来彼此形塑的。

对我来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可以是一种“抵抗被再度殖民”的抗议精神，铺上一层对深爱家园被践踏的义愤、忧伤交杂在一起的感情，背后的讯息可以是对理想香港的追求、对现况的极度不满。

端：“不割席、不笃灰”这些口号对于共同体的形成，是很清楚的，也比较容易理解。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句口号比较复杂，你怎么看待这个口号？

周：对这口号，每个人的解读都很不同。因为它其实是一体多面，似有实际指向，但也是比喻象征，意思留白，就是看每个人如何解读。有些人对它很有共鸣，很能产生内在的情感共震，有些人也很抗拒、会解读成是怀念港英时期，甚至指斥为号召港独。其实不同的群体都会有自己去解读的方式，这些解读之间，有可能会是矛盾的。它会不会有很深很完整的分析？可能会有。但很多人在现场喊的时候，情感投入、受人感召、自我召唤，已彰显了其效果。

其实我们对这个口号，可以有更多元的理解。对我来说，它可以是一种“抵抗被再度殖民”的抗议精神，铺上一层对深爱家园被践踏的义愤、忧伤交杂在一起的感情，背后的讯息可以是对理想香港的追求、对现况的极度不满。香港人现在就是“不妥港府认大佬，不要共产党大佬文化，你大佬唔系我大佬”，拒绝认中共做大佬、拒绝被鱼肉，想要光复那个“有自主性、不受中共打扰与鱼肉的南方岛屿城邦”，这意涵在我看来是相当坚定的。

不过还是要再强调，具体所指为何，还是要看每一个喊的人心中所想，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对我来说，香港这场“百年渔港梦”到今天，其实面对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读Karl Polanyi的时候，读到他说从贵族封建社会转型、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欧洲社会如何保护自己，觉得很有启发，今天香港似乎也是如此，感受到我们正在失去平衡，兴起了一种社会要自我保护的感觉。所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里面可能也有一种感受是：我们要保护这个地方，不要再让它坏下去，让它依然是自由的、是可以让人有尊严地活下去的地方。

其实这样的困境，并不只是香港独有的困境。在金融海啸之后，东亚发展型国家都普遍遇到了这样的挑战。旧的体制能不能够回应新的时代？国际资本的流动规律在改变、本地工业必须要转型升级、香港要维持金融城市的体质但又要控制房价。这些议题会造成不同社会张力，逼迫东亚模式面对困境。

但香港也有一个地方是特别的，就是林郑说的那句“我有两个老板”，香港政府真的有两个老板，它必须同时要面对中共、又必须调整自己的社会政策去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很可惜的是，林郑现在解决的思维，都还是很过时的，我看她在纽约时报网写的文章，那种想要“谷底反败为胜”、“坏新闻当作好宣传”的感觉，除了她在纽约时报的言论，还有港府原本在推的大屿山填海、人工岛等等这些政策，根本是一套几十年前的发展逻辑、态度和语言，根本大开倒车，没有办法解决当下的困境，更是完全回应不了环境气候政治对于沿海城市的冲击、人类文明存亡的挑战。

让语言成为真理，会让倡议的人变成一个封闭的群体，无法与其他群体共享。最重要的是，去理解每一种语言，不管是学术的、或者一个运动口号，它的潜力与极限在哪里？

所以说，在运动里，我们就会慢慢去问：香港该怎么走出这个困局？中港之间关系是怎样？中港台之间关系是怎样？香港政府跟民间是怎样？甚至一国两制是怎样？是运动让我们看到社会张力，去看见这些矛盾非常深刻的层次。这些矛盾是否能马上在运动中被处理？不一定。只能说，运动可能可以打开这样的空间，但一切都还是很混沌的。

讲出这些语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确实会产生一些效应，但语言也同时是一个工具。它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纲领吗？是否可以让更多人去认识和理解？这些都可以去分析和讨论，但绝对不能成为一个绝对真理，否则就会很危险。让语言成为真理，会让倡议的人变成一个封闭的群体，无法与其他群体共享。

不管是学佛、比较文学，或者现在念地理学，我觉得这些思想的传统对我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学问会很重视过程，看不同力量如何汇集，去谈人是不同力量组成的生命体、人活在自己的文化与政治过程里。如果有暂时归纳出一些语言，那只是方便大家去讨论，但要靠语言来完整捕捉这一切，其实是很难的。我们只能尽量去（对语言）保持警觉。最重要的是，去理解每一种语言，不管是学术的、或者一个运动口号，它的潜力与极限在哪里？

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一个很强的特质，就是可以在运动中重新思考语言，从自己的处境出发，重新去思考语言。这对比到恐龙，可能就会非常不同，就这点而言，人类是很特别的。



2019年7月27日，元朗冲突中，示威者以床褥抵挡警方的攻势。摄：林振东/端传媒

端：你觉得运动未来会如何发展？你自己想要如何行动？

周：除非运动又发生什么很大的转折事件，不然我想，就是从每天的这种小事件、小变化当中，去慢慢打开不一样的可能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2014年之后，有种感觉是，香港未来已经被关掉了、就这样了、没有希望了。但在2019年，抗争者又慢慢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这个运动激活了香港。这个运动不断地在挑战中国的政治宣传、重新说香港的故事。香港故事可以不从回归讲起，可以不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讲起，是可以重新去打开这个辩论，去讨论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威力无穷的。

未来运动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这种“不愿意放弃、不愿意妥协”的态度，会慢慢把香港的未来打开。当然，这过程会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没有办法马上拿到，没有办法马上看见改变。但这慢慢寻找过程，也会是最精采的。

譬如《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我觉得它正在重新定义香港人的精神面貌，重新塑造我们的个性是什么，重新去找回香港人对自身奋战同伴的骄傲。香港人一起在为香港做同一件事情，在海外也做组织、搞连依墙，这种“同步感”是很强的。其实我们有我们的尊严，虽然说运动不割席，但在某一方面，我们跟中共很专制的那一面，是彻底割席的。

我在美国听到有个女生演讲，她说她来美国很多年，觉得自己一直很讨厌香港、很想离开香港，但直到这一次运动，她才发现原来自己没办法离开香港。她在台上问说“为什么香港人都要靠其他人才能争取到我们想争取的东西？”她会去问这样的问题。看得出来，运动正在重塑参与者对香港的看法、重塑自己跟别人的关系。

这些新的关系，会形成不同的组织、不同的计划。可能会有新的斗争，当然也会有新的结盟。在这个新的局面下，需要说好一个新的香港故事，其实现在的香港故事还有很多拓展空间，可能还需要很多文化上的翻译，现在提到香港，大家都还是倾向说它是一个金融城市、说它是中美贸易战下面的一个关键，但这座城市的潜力远远不止这样，香港还有很多可能性是尚待发掘的。

我现在想把美国的新移民、原住民和黑人抗争历史好好拿来念一下。因为想在美国跟别人建立结盟、呼吁美国人来支持香港，那你必须要把两地之间的连结说清楚；要把这连结说清楚，就要把美国在面对的处境搞清楚。如果你不希望世界的交流只是国家与国家的结盟，而真的存在民间与民间、人跟人之间的连结，那你就不能只是交往其他国家的政治菁英，还要面对一般人的生活处境是怎样。这跟lobbying是不冲突的，你做lobbying也是要让选民去觉得香港是值得关心的、议员也才会觉得自己应该关心。你如果只是说我们受中共逼压、我们被香港警察暴力对待，那坦白说，对美国一般人来说，很多人会觉得，干我屁事？不少人就只会说As an American dude, I have respect for Hong Kong and Goodluck!

其实，每次遇到世界有大变动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全世界寻找盟友、想跟其他地方的人一起去寻找出路是什么？一战、二战、60年代、二十一世纪初反对全球化运动的时候，人们都做过这样的努力，那现在也是。不只有香港，是这个世界好像有些状况出了问题，我们需要一起去寻求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香港想要有更多世界盟友，就不可避免要去看全球尺度下香港与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这次运动拉出来一条新的战线，可以去想一想。

雨伞运动

周永康

伞运五周年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中国大陆民众的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逻辑
2. 香港人是中华民国的什么人？港人赴台寻求“政治庇护”的两种模式
3. 删帖、退群组、被查手机，那些时刻担忧被解雇的国泰员工
4. 国泰的“战场”不只在香港
5. 端传媒针对香港警方要求配合查案的声明
6. 读者来函：台湾，是否能给沉默的陆生一面连依墙？
7. 915游行：大批市民自发到港岛“行街”，入夜后北角爆激烈民众冲突
8. 观众将被鬼魂带往何方：游戏《返校》拍成电影的理由
9. 雨伞5年后，留下的我们：搵食、抗争还是移民？
10. 李立峰：市民如何看待示威者与警方使用的武力

编辑推荐

1. 雨伞5年后，留下的我们：搵食、抗争还是移民？
2. “政治唐璜”还是“人民之友”？希拉克叱咤法国政坛的一生
3. 行动者手记：去年#MeToo运动中，我所经历的故事
4. 赵永佳：林郑对话之前——“废青论”是如何炼成的？
5. 社区对话：林郑称香港属于今天的年轻人，参与者：用耳朵听，但没有用脑思考
6. 台港陆学生返校后迭起冲突，专访受伤港生：不会退缩
7. 观众将被鬼魂带往何方：游戏《返校》拍成电影的理由

0. 匿名、系人、内部努力：「无人言」运动中的即时信息言

9. 李柏升：面对连续断交，台湾援助式外交的未来何在？

10. 夏日催泪烟中的香港孩子：当他们问迷路还找警察吗？当他们拿起玩具枪……

延伸阅读

周永康、杨政贤：放下成见展开对话——香港民主运动的重整与出路

非建制派能否放下身段及过往的执著，为了香港的民主发展，进行内部对话，重新出发？

伞运关键词书写笔记（二）：“拆大台”——从自发群众到多元领袖

“拆大台”精神作为伞运遗产，其影响是否能走出占领区，关键在于它能否能有机地完成在地转化。

伞运关键词书写笔记（一）：假如雨伞是失败的，为何有必要重启记忆？

梳理关键词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种书写社会史的方法。

周永康：伞落之后，革命是否唯一出路？

回顾雨伞运动，港人的公民抗命实际只是有限度实践。

专访周永康：穿过雨伞运动的那一道窄门

他曾经历运动后的最低潮，不敢出门，无法见人。而穿过这道窄门，他借助佛学反省自己和运动，“运动不是只是关乎取敌首级，而是关乎重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